美麗的、倔強的花朵

——「中國新文藝大系」之後

施淑

從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揭開我國新文學運動序的曲，到現在已經整整六十年了，在這個時候，「中國新文藝大系」的發行，對當前的文藝思想界和創作界，不能不說是一件意義深長的事。

六十年來，經過政治上、思想上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物質條件的激變，曾經爲我國現代化過程啓蒙的這一運動，它的原因、目的、精神實質和歷史意義，已逐漸爲人淡忘。如果歷史並非來去無踪的傳奇，如果新的現實挑戰可以在經驗裏找到解決的因子，那麼在我們的文藝界困惑於當前的社會——歷史現實的時刻，重新檢討「中國新文藝大系」的理論與實踐，是必須的而且有助益的。

進步的西方，落後的東方，這個樹立在種族偏見之上的神話，隨着基督教的福音和工業革命後的歐洲文明，同時驚憾了清末維新人士的心靈。如果有所謂「落後」的話，那麼「進步」正好會因此準備上路，在還沒有了解到這個帶着苦味的眞理之前，辛亥革命後的新生知識分子，幾乎普遍喪失了做一個中國人的自信。這些具有國家觀念和世界意識的西化派人物，在那同樣是因外加的民族屈辱感而生的國故思想逆流中，高舉着民主、自由、科學的旗幟，努力想從幾千年封建制的黑暗中獨立出來。像歐洲文藝復興之從經院哲學的聖光圈分裂出來一樣，他們的熱情首先集中於「人的發現」這一命題，他們天眞地幻想掙脫了封建宗法的血緣紐帶之後，他們就可以成爲擁有「普遍的」、「永恆的」人性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

就是在這對於「人」的憧憬中，文學領域展開了以說「人話」爲方法，以「人化」爲思想綱領的「人的文學」運動，也卽是在我們的文學史上開創了現代紀元的新文學運動。這段思想活動的過程，生動地保存在新文藝大系論戰一、二集裏，特別是「人的文學」、「思想革命」、「平民文學」、「易卜生主義」等最近重新被提出來檢討的文章裏。

在「人化」的前提下，新文學的鬪士們提出了資本主義思想階段中的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的要求，運用這觀念武器，他們批判了表現於傳統文學中的奴隸、殘忍、迷信、誨淫等屬於古代東方的，因而也是封建中國的落後性質。在他們的「文學革命軍的大旗」上，他們於是「大書特書」了國民、寫實、社會等三大主義的文學宣言，企圖通過平易抒情、新鮮立誠、明瞭通俗等途徑，分別卸下長期以來一直以支配形式出現的貴族、古典、山林文學的虛假面具，消除它們的雕琢阿諛、陳腐鋪張、迂晦艱澀的中世紀性質，從而建立表現新時代呼吸的自由平等的「人的文學」。就歷史發展來看，新文學運動在這方面的努力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它爲我國過渡到現代的階段，做了意識上的準備工作。必須了解到這一點，才能明白今天看來根本不成問題，而在當日却花掉論戰者大部分精力的白話文提倡的意義，因爲這被當日國故派痛斥爲「引車賣漿之流」的語言，正是以平民身分初現歷史舞臺的新時代鬪士們，藉以表達他們的熱情和理想的聲音。

穿上人道主義的思想武裝，以個性解放的姿勢走上世界範圍的歷史舞臺的新人們，是勇敢的，他們的月光朝向長遠的未來，他們把一切屬於與中國的東西，看成了應該埋葬掉的人類前史，「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透露了這個消息。但是這些性急的過渡期人物，却忽略了二十世紀初複雜的中國現實，忽略了同時被封建和殖民經濟困阨的中國現代社會的難產性，因而像一般的啓蒙思想者所表現的性格一樣，他們在有新世界他現的可能裏，漠視了新世界難以出現的現實，他們只善於幻想那預約中的黃金世代，而不了解現實社會的改造方向，於是只能抽象地進行人性的還原工作。尤有進者，在所謂進步的西方的催眠下，他們於克服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狹性後，却遺落了他們爲中國和中國文化找尋出路的初衷及責任，狂熱地膜拜起

全盤西化的新圖騰來。「『人化』卽歐化，歐化卽『人化』」（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這個公式成了他們的思想實質的一個側面。

在這樣的熱度下，初嘗解放滋味的新人們，不能不走上資本社會的個人主義的虛幻形式，在沒有現實基礎的幻洲上，歌唱他們自己的歌。於是在創作態度的取向上，我們看到以「藝文之神」自居，唯「Inspiration」是從，而事實上「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爲而生」的告白（瀰灑臨凡曲）。在作品方面，則有屬於尼采哲學的死硬翻版的「超人」，以安那其思想的說教者姿態出現的「海的渴慕者」，還有盡情渲染個人生活的小小一角的「木犀」，及至充滿沉淪幻滅情緒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小說一、三集），等等。

然而就像世界歷史進程所顯示的：「市民階級之人道主義的理論家，是市民階級最初以人道之名對封建秩序挑戰時的行動的解釋人」（A. A. Smirnov），必須了解到這一點，才能看清新文學鬪士的歷史任務和歷史限度，才能認識到他們的言論和作品中的理想主義的高昂品質，那是後來的西化的模倣者無以望其項背的。也必須了解到這一點，才能正確地解釋他們經過五四以後一連串的政治風暴後，發展起來的精神的另一面影。

巴黎和約的條文，揭穿了以進步者自居的帝國主義者，一點也不人道更不平等的陰謀。不論西化的膜拜者如何醉心於人化、博愛的力量，如何膨大世界性的自由人形象，一切想像終歸逃不了這現實的驗證，他們心靈裏供奉的「人類一體」的烏托邦，也不能不在現實面前土崩瓦解，正是在這裏，啓蒙者清醒的、理智的性格，發出了實際的、具體的力量，曾經是他們的改革行動的酵母而後又被他們遺落了的國家主體觀念，再度甦醒。也正是在這裏，辛亥革命後新生的知識層發生了分化；在文藝領域，這表現爲：一邊是尾隨西方文學的末流，在中國的現實面前落荒而逃，一邊則擁抱祖國大地，加入那美麗的黃土上的各階各層人。

帝國主義者猙露無遺的主子架式，侮辱了新人的尊嚴，連帶地摧毀了他們用朝聖者的信仰去尊奉的西方，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實是：在所謂人化的世界裏的人化的壓迫，而透過帝國主義者的苦心設計，這表現

爲麻痺民族認同的世界範圍的殖民形式。因此問題很清楚地顯示出：普遍的、永恆的人性的答案，除非自願任它在風裏飄揚，在那預約中的黃金世代未到來之前，必須而且只能在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的條件上取得它實質的內容。然而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在新舊現實的重阨下困頓的新人們，不可能立時走上正確的路向，但比之於五四之前的單向摸索，那路向是較正確地向現實靠近了。如是，在文學思潮中我們看到這樣的反映：

我們覺得文學是決不容輕視的。……惟有他，能够立在混亂屠殺的現世界中，呼喚出人類一體的福音，使得壓迫人的階級，也能深深的同情於被壓迫的階級。他是人們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的介紹者。（史科集：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

是的，啓蒙者的烏托邦色彩，他們的改良主義性格，仍舊存在着。但能認識到浮現於混亂屠殺的現世界中心的壓迫與被壓迫的事實，應該何去何從，因反抗被奴隸的歷史使命而生的新人們，該是有力量判別了。與這相應，在創作實踐上，我們看到了描寫學徒生活的「三天勞工底自述」，描寫農村木匠悲哀的「鄉心」，還有表現農村破產中，賣兒女的貧農在骨肉之愛和飢饑的威脅間掙扎的「偏枯」（小說一、三集）。突出於這一類作品之上的是「紅燈」和「蚯蚓們」，這兩篇植根於泥土和大衆的小說，不獨在藝術上表現了新文學的優良寫實傳統，在意識上更反映出自覺的、深沉的而且敢於正視現實的五四文學的人道主義的積極性質。

「中國新文藝大系」，這記錄着我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的成績總集，清楚地留下了那階段的文學工作者，在迎向歷史與現實的挑戰時，艱難的、英雄的足跡，更展示了應該由後來者繼續前行的道路，那堅實地朝向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目標走去的唯一道路。

以藝術形式問題發軔的新文學革命，就像人類史上的其他革命行程一樣，爲了壯大自己的力量，開始時不得不借用不屬於他們的華麗衣冠，因而在抽象的自由、人性與具體的社會現實間，表現了辭藻勝於內容的現象。經過六十年來嚴酷的歷史教訓，作爲五四新文學支流的臺灣文藝，必將在這經驗的啓示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形式和內容，盛放出兼二者而有之的，美麗的、倔强的花朵。